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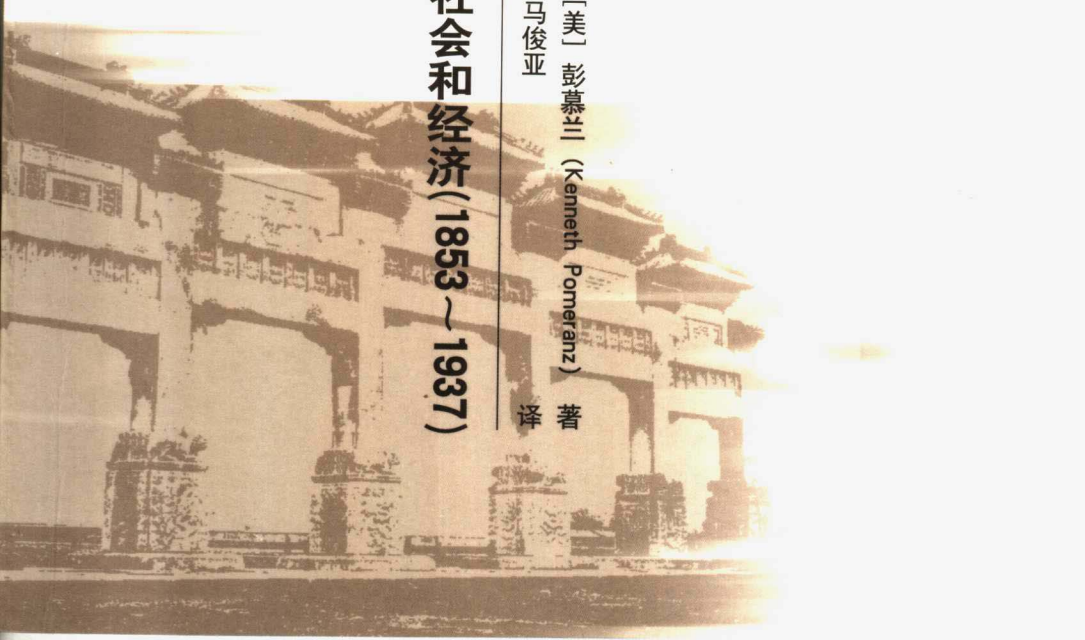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美]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著
马俊亚 译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著
马俊亚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1853~1937)

著 者 / [美]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译 者 / 马俊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责任编辑 / 柯 舟
责任校对 / 边 申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3.25
字 数 / 309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686-1/K·193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4-255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我的双亲，他们甚少告诉我该做些什么，但却寓教于行；并献给本杰明，我从他那里获得的助益远过于他所知道的那些。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

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

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中文版序言

本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始于1985年，论文完成于1988年。那时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变化，尽管其意义还不甚明了。

从长远角度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中国背景和外国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在大约30年的几乎完全隔绝后，重新进行了交流。尽管所有相关之人显然均受其益，但开始阶段总是别别扭扭，因为太平洋两岸的学者们要竭尽全力来弄懂对方通常所提出的问题类型。当我1985年抵达山东并说明我的研究范围是20世纪该省西部的一个特定地区时，大多数人认为我不是对义和团起义、就是对抗日战争发生了兴趣。当我说明我主要对这两次事件之间所发生的事感兴趣时，这总是意味着无所足道。而从20世纪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或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来说，这并非关键之所在。但从我受其训练的那种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恰好是这个地区突发重大事件的相对次要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使考察更缓慢出现的模式或观察我最感兴趣的事——因为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的网络中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对他们生于斯的地区的边缘化是如何做出反应的——成为可能。我

的一个相关的兴趣——试图解释施坚雅所用的中国史的地理依据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被较注重人类对地貌（如运河和铁路）的改变所修正，它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当施坚雅的著作在美国背景的中国学领域风行一时之时，它在中国却并没有引发人们太大的兴趣。

其时，在西方学者中间，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心智史。这一方面受到了来自文学和人类学中被称为“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尽管这两者并非一回事）的新方法的推动。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借来的方法能提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模型的史学家们，经常发现比其预想的要更复杂，而与其定义相比，总有太多的例外：这种情形特别适用于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们，那里的类型是源于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欧洲经验，其追随者们似乎很少能满意地加以应用。新文化—心智史反对重视对模型的研究，尤其反对重视对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相反，它主张考察单独的事件或文献，来理解它们对那些与其相关的事物的可能的意义。这牵涉再造那些人们曾用来解释其世界的类型，而不是引进我们的类型，即便那些类型中的某些类型（如阶级）对我们如何分析这个世界极为关键。同时，新史学强调我们不可能经常发现一个为所有那些与之相关的事件所共有的事件的单独意义：当我们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识的假设时，我们几乎总是发现不同的人以极不相同的方法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并提醒我们在断定这些观点的任何一个具有优势时，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这种格调的珍贵著述已大量出版——并将继续出版——时，它们还引导着我们离开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的历史问题：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出现和垮台、为什么富裕和贫穷像现在这个样子来分布，为什么在某些时空中产生了大量的抗议运动，而其他时空中则没有

的问题。本书从另一个方面仍然着重研究这些类别的问题。

第二种趋向具体说来与中国史研究具有更多的关系。没有人能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民革命背景的中国提出异议，这场革命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没有人能否认现代中国（以别于20世纪后期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鲜明之处主要是由一个具有农民背景的政党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从20世纪50~80年代，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著述其目的在于解释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50和60年代集中研究旧士绅如何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农民自身的社会史日渐增多（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时间里，美国与越南和其他地方具有农民背景的革命运动的开战，无疑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强度）。这种研究导源于那时历史编纂学的传统。

但到我着手这项研究之时，那种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现端倪的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不是人们不欢迎农民学对事件的解释（实际上，研究印度农村的学者们的尝试，作为底层研究运动的一部分，曾极其令人鼓舞），而是我们所发现的让这种方法变得实用的记录实在太少。其间，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也似乎偏离了农民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红”的强调后，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对“专”的培育，导致了对群众运动（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的重新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与以往相比，较多地强调了其作为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并对作为这场运动中潜在的现代化人物洪仁玕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早期迹象。地方史和回忆录（如《文史资料》丛刊）的大量涌现，也使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当地革命活动中那些人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由中共从外部派来的组织者：进步的学校教师和青

年等。

这种偏离农民运动的变化作为历史的主要原动力很快也在西方汉学家中体现出来。并且，由于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该国沿海城市开始出现的新中国，此前许多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出现的似乎很像是历史死结的现象——广告和商业文化、中产阶级的市民团体、西方训练或西方影响的工程技术人员兴起，等等——似乎再次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伴随着向文化史和心智史的转向，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卷帙浩繁的重要著作涌现了出来，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新的著述通过提醒我们都市的事件和角色，把对某些不平衡进行了重新梳理，但有时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并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结果，尽管本书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但当它出版时却备受好评（获得了那一年美国历史学会现代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它并不能与对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讨论至为关键的大部分争论——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市民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出现的讨论——吻合。但近年来的发展大概使本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比其首次出版时意义更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中国环境史的兴趣越来越高。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与治水——既包括黄河，也包括大运河——密切相关，本研究与那种类型极为吻合，并且，这项研究成了更大的西方汉学家（包括罗伯特·马克斯 [Robert Marks]、埃多德·弗美尔 [Edouard Vermeer] 等人）研究群体的构成部分，他们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所倡导的方法，试图把一个特定地区在长时段里的环境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而当我对这个地

区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时，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其他环境问题——特别是与砍伐林木和燃料供给有关的问题——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总之，这个生态方面的变化，尽管通常游离于标准经济学（如，燃料很少通过市场获得，并因此被对人均年收入的估计所忽略）之外，但大得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的画面，这幅画面仅是在我观察具有巨大市场的商品（小麦、棉花等）时所获得的。今天，人们对当代的生态问题和历史上环境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书所关注的另一个与目前似乎特别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当然，与任何巨大的社会一样，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而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自然资源、政府的政策或特定地区的文化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差异。不过，近年来，中国某些地区（主要是沿海）经济的快速成功已经造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经济差异，并增加了人们解释这些差异的兴趣。在那样的背景下，本书强调华北沿海和内地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也可能是开启了一项新的有意义的研究。基于 100 年前的条件与今天的条件明显大相径庭，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似乎与此密切相关：参与到国际经济中的沿海与总的说来并不一定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内地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吗？或者说，用来支持经济增长或保护其免受帝国主义侵害的政策加剧了内地的困难吗？在这个阶段的华北实例中，本书证明了政府的政策确实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加贫穷——沿运河地区一度为政府特别关注的事实，说明这样的一种变化极为痛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会发生同样的事。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原因之一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对外国威胁中国主权的一种反应——今天的情形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从那时起，在其他研究中（既包括拙著《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

济的形成》，也包括研究更近些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系列论文)，我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正在发展着的、重新形成的中国地区之间关系的干预，对某些地区有推动作用，但却极大加剧了其他地区的困境，并短暂地把中国某些最肥沃的地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而把它们与新的海外贸易伙伴联在一起）。这些扭曲了的地区性的变化，反过来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政府维持甚至是基本的秩序的能力，极少提供帮助推动现代发展所必需的服务。就那个意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把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这个模型把中国不同地区的成功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我们解释内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更为普遍的是，对当代全球化的争论，既激发了对这种通常被 80 和 90 年代初期的后现代史学家们所回避的大规模变迁叙述的兴趣；并且还激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新的兴趣，部分原因是由于 19 世纪后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似乎特别预兆了当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按照那种趋势——包括某些我认为肤浅地把帝国主义与市场融合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无视其代价的新著作——我认为本书的分析、特别是对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做出的政治决策造成的经济影响的缜密思考，大概比其初撰时与今天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本书对一种特定的变化——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向机器棉纺厂赞助的新棉种的过渡——显示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决定哪个地区可以在新机遇中获得优势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它还证明了影响全部社会经济现象——对新棉种的接受、农村社区与都市信贷市场的关系、对治水危机的反应——的社会结构的同样特征，就是那些本地区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义和团运动——正如周锡瑞所描述的那样——到这个地区共产党活动的早期阶段）形成不同的地区性反应的特征。在本

书尝试把环境、日常社会模型和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与社会运动的模型联系起来考察时，本书大量地利用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史。但当那些著作较多地注重研究成为中共主要根据地的地区并因而非常直观地试图解释对革命的参与时，本研究则考察了一个更加迂迴转向革命的地区。那么，在某些方面，对这个地区比那些变成了根据地的地区更少使用政治的变化来解释。但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变成中共的重要资产，它肯定会成为、且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难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水灾、匪患及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无法在这个地区内得以控制；而持久的混乱（与成功的革命动员相比，其英雄气魄要少得多）也是中国 20 世纪早期政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而为什么其他地区证明了直到解放后才能够被治理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有趣。我想，至少问题的部分答案将被证明是源于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地区性推力的变化，而某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则加剧了其他地区的“落后”——特别是在一个中国领导人那时不得不时常担忧似乎对极为脆弱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的环境中。我希望本书对揭示那些推力聊尽绵薄之力，而在那些途径中，不少——尽管丝毫不值得欣喜——依然与今天息息相关。

彭慕兰

2004 年 8 月 31 日

鸣 谢

很难说这部书是何时启动的。一种答案可以说成是 1979 年秋，当时作为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我不经意听了高家龙的中国史课。到了学期结束，我想以中国史为业；此后，高家龙一直是我极为钦敬的一位老师、批评者、引路人和朋友。在研究生院，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愿意忍受一位研究中国的古怪后学的导师，并帮助我克服了后来遇到的许多困难。乔纳森·斯宾斯和比阿特丽斯·巴特利特对我是有求必应，并且还不止这些；自我离开耶鲁后，这两位仍然与我亦师亦友。与我在耶鲁一同学习的另外两位人物——约翰·梅里曼和詹姆斯·斯科特——也一直对我帮助有加；尽管他们两人的著作都不是研究中国的，但这两位的影响在这部书中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作为一项计划慢慢地成为一篇毕业论文，后又成为一部著作，其他许多人也提供了有益的意见。这些学者中最为重要的是王国斌，他阅读并讨论了似乎无休无止的正文文本；我尚未遇到比他更好的同事。另外许多人——韩起澜、李中清、彼特·林德特、唐·麦克罗斯科、汤姆·罗斯基、詹姆斯·斯科特以及 1989 年 4 月“南加州中国论坛”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对章节大纲、后来收入本书的论文及其他零碎片断做了有益的评议。作为加尼福利亚大学出版社的文稿审读人，周锡瑞提供了

使本书最后改定稿更加精辟的意见；其他的匿名审稿者同样助益匪浅。

在研究阶段，我从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从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那里获益颇多。在美国，我在（耶鲁）斯特林图书馆、（哥伦比亚）斯达尔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康乃尔）查里斯 W. 瓦森收藏库、（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了许多稀见资料。在中国，我受到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山东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热情接待。我要特别感谢韦庆远和鞠德源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为本书使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文件中的几幅照片提供的方便。

本项目在研究过程中，获得了许许多多制度上和经济上的资助。在研究与撰写的大部分时期里，耶鲁东亚研究委员会提供了研究经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为我安排了很关键的在中国为期一年的研究；最后我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ACLS-SSRC）的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与加州大学校长研究基金在学术假（基本上全用在了一个新研究项目上）中的资助。本书的编辑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希拉·莱文和艾米·克拉兹金像所有作者所期盼的那样予以帮助并进行了愉快的合作。作为文字编辑的乔安妮·桑德斯特姆梳理了许多不妥帖之处，并对我从未注意到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解决办法。

我还要感谢那些不在上述名单中的许多人。戴维·帕金森提供了一份我离开济南后可以说是遗失了的关键文件的新版本。阿兰·麦克唐纳和詹里·翁布尔他们把我从咬文嚼字的苦海

中救出；霍德·芬克来斯坦因使插图 1 变得非常清楚。最后，莫琳·格拉夫斯做了超过所有人——宣传者、审稿人、最为重要的同事——的工作，使本书得以面世；如果没有她，我无法想象本书、或者是本书在成书中的日子。